

新加坡华语的“星期”“礼拜”之争

林思和



《西班牙—华语字典》有关“礼拜”的词条

华人在以前的农耕社会,过的是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”的生活,生活节是依循年季月以及二十四节气运转,以求配合日月天候的变化。

西方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,带来西方的历法和纪元制度,它不但深深地影响南洋华人的时间观念,也在后来改变华人的作息习惯。

西方历法以七天作为一个周期,把第七天规定为休息日,并在这天到教堂“做礼拜”,这是受《圣经》影响的宗教文化。

华人使用的农历,原本没有“周”(星期)的观念,西方历法以七天为一周的观念,在南洋直接影响华人,可以说最先接受“周”这个观念的是南洋华人。

“礼拜”时间单位的出现

“礼拜”一词古已有之,并非外来词,从《辞源》可查到其原意:“致礼于所信仰的神佛”,最早出自于相传是汉朝班固所著的《汉书》。

“如遇礼拜日,上半日市绝交易。”“礼拜”在第一例中是动词;第二例中它是动宾结构的短语,还没成为固定的复合词。

“礼拜”产生新的义项,以七天作为一个周期的时间用语,是在16世纪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时期。

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文献资料,出现在1620年代编辑的《西班牙—华语辞典》(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cum),这部辞典由西班牙传教士与寓居菲律宾的闽南华人合作完成。

这部辞典的后面部分,附录一些度量衡以及数目字和时间的用词。附录部分的编排反过来以华语作为词条,首列的是华文词条的拉丁字母拼音,显然用的是闽南语;第二列是华文词条,第三列是

西班牙语的对应用词。

惊喜地发现,在计时用语部分出现“礼拜”各日的称谓。依次排列为:礼拜(semana i Domingo)、礼拜一(Lunes)、礼拜二(Martes)、礼拜三(Miercoles)、礼拜四(Jueves)、礼拜五(Biernes)、礼拜六(Sabado)。

最有意思的是编者加一段按语:“由于他们(华人)没有各个周日的对应名称,因此只好以数字来表达”。

吸引人注意的是,编者在“礼拜”词条下,分别列两个西班牙语对应词“semana”和“Domingo”,也就是说“礼拜”分别表达星期(week)和星期日(Sunday)这两个词义。

南洋华社接受“礼拜”的时间用语

“礼拜”成为华语的时间用语,以及“七天一个礼拜”的观念在南洋被华社接受,时间上显然早于中国200多年。

在《开吧历代史记》这部早年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的纪年史书中,有一段乾隆四十六年(1781年)的记录,用“上礼拜”和“礼拜三”;

在印尼吧城(雅加达)华人公馆的《公案簿》中,每段记录的开首阳历和农历的纪年并用,其中“礼拜X”和“拜X”并行出现,在行文当中

“洋教”和“祖先崇拜”的意识形态之争。

“礼拜”时间用语观念引入中国

今天“礼拜”已被“星期”取代,成为正式的书面语,“礼拜”则沦为民间的口语。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言文分家的问题,造成这个变化的原因在哪里?它经历哪些意识形态的纠葛?背后有哪些政治史上的含义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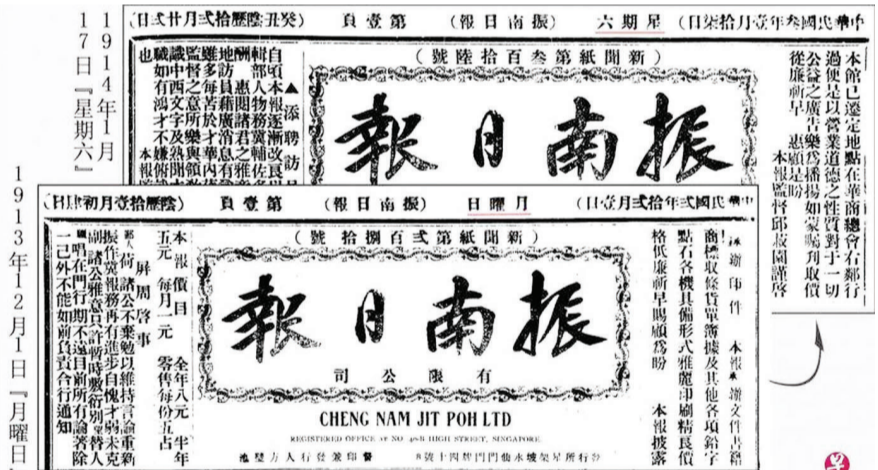
要说明这个问题,得回头去看“礼拜”这个词,从南洋传入中国后,因水土不服产生的文化冲突。

鸦片战争后,中国王纲解纽,人心不古,维系千年为一统的传统社会和伦理道德思想,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分崩离析。

在效法西方引进西学驱动下,为介绍新事物和新观念,大量新名词出现和引入成为必然。西方思潮的汹涌澎湃,同时也唤起中国士绅的民族主义意识。

“礼拜”这个南洋的时间用语和它涵盖的“七天一周”的观念,也在这个时期被带进中国。

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,“礼拜”“礼拜日”和由“礼拜”衍生的“礼拜X”不时出现在



《振南日报》1913年12月1日写着是日为“月曜日”,到了1914年1月17日“七曜”纪日法被取代,换成“星期六”

中国的文献上,比如《海国图志》(1852年)、《航海述奇》(1866年)、《游美洲日记》(1873年)、《沪游杂记》(1876年)等。

“礼拜”时间用语的替代

这时期出现在文献的“礼拜”及“礼拜”的衍生词,并不能证明中国社会已经接受“礼拜”这个观念和把它当作时间用词。

晚清时期推行西方的阳历已经成为改革派的其中一个诉求,他们主要从时间计量制度的简单可行和科学的角度,来论述使用阳历的必要性。

早期南洋华人移民包括新加坡的华人移民,只有地域的观念,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意识,他们“唐番”意识的启蒙,是在南洋与外国人的初遇;他们“唐人”身份和“唐山”观念的唤醒,是以乡土文化和乡音方言作为依附。

“礼拜”观念的融入华人社会,“礼拜”化为南洋华语的时间用语,在南洋以及在新加坡被接受和普及的过程,既没有碰到唐番之分,产生抵触情绪的困扰,也没激起



《叻报》1887年8月20日写着是日“礼拜六”(下图),到了1925年7月4日“礼拜六”换成“星期六”(上图)

在民族主义心态的驱动下,一些中国士绅坚持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认为应该从老祖宗的文化中找出相对应的词语。

有者则认为“日汉同源”,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引进西历和周休制度,并以“七曜”纪日法来指称一周七天,分别用日、月、火、水、木、金、土来命名。

“星期”替代“礼拜”

1890年代末,汉语旧时“星期”这个词,原指“农历七月初七日,牵牛和织女二星相会之期”。

1906年清朝主管教育的学部宣布“星期日公休为世界通例”,并在用词上主张“名曰星期,并不名为礼拜”。

1911年,中华民国成立,正式宣布废除阴历,采用阳历。在文化自主与民族认同的驱动下,“星期”的使用成为社会主流。

新加坡的“礼拜”“星期”之争

直到19世纪末叶,“礼拜”这个词和它所代表的宗教性观念,在南洋地域经过200多年的使用,已经融入华人社会而被日常化。

早年中国朝廷视流散(diaspora)海外的移民为“刁民”,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,让这些流散华人成为海外遗孤。

新教科书和新报章的出现,成为掀起这一波民族主义思潮的工具。“礼拜”和“星期”之争的战场,也从中国搬到新加坡。

这段时期新加坡出现的华文报章计有十几种之多,其言论倾向有保皇、维新、革命(亲国民党)和激进之分。这里可从各个报章更换版头“礼拜”用语,改用“星期”的时间作

为切入点,来考察新加坡这段“礼拜”与“星期”之争。

1881年创刊的《叻报》,是新加坡具有首次书证的华文报章,由土生华人薛有礼创办,是一份极端保守的保皇派报章。

1890年创刊的《星报》,由古友轩印刷馆老板林衡南创办,立场保守,从创刊到1910年停刊,版头均采用“礼拜”。

1898年创刊的《天南日报》,由新加坡著名文人邱菽园创办,拥护维新主张,从创刊到1905年停刊,版头均采用“礼拜”。

1907年创刊的《中兴日报》,由同盟会会员陈楚楠、张永福创办,从创刊至1910年停刊,版头都是采用“礼拜”。

1911年创刊的《南侨日报》,中国进步党党报,起初采用“礼拜”,1913年2月17日改为“七曜”纪日,直到1914年3月31日停刊。

1919年创刊的《益群报》,立场激进,不但在创刊号一开始就采用“星期”,并且从左翼思维的角度出发,关注劳工福利,推动星期休息问题的讨论。

分别创办于1923年的《南洋商报》和1929年的《星洲日报》,创刊伊始版头就采用“星期”,不过行文还是常用“礼拜”,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二战前。

纵观新加坡各报章启用“星期”的时间,比中国的报章较迟,因为新加坡华社根深蒂固的用语习惯,以及民族意识较为淡薄。

新加坡华语在书面语上改用“星期”的行动,是一种和风细雨和较为被动的行为,它承自中国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的余绪,因此既没激起中西宗教之争的涟漪,更没点燃中西文化冲突的火花。

《爱国白话报》创刊号写着是日为“星期三”(原载4月16日《联合早报》)



《爱国白话报》创刊号写着是日为“星期三”